《批评认知语言学》导读

张辉　张天伟

1 引言

《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一个老话题，即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或 CDS)，本书所探讨的是语言表达与认知识解（cognitive construals）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人们的意识形态、观点与立场表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认知语言学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综合和全面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以使用为基础的(usage-based)和以体验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语言系统本身，关注语言系统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而不是语言系统在话语与语篇中的实现(Hart 2019:1)。本书探讨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批评认知语言学，批评认知语言学是批评话语研究下属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认知语言学下属的一个分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提出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称之为应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萌芽形式之一(Hart 2019:9)，其发展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理论和应用分析都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语言是以使用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构成说话人语言知识的结构和组织原则是通过语言使用涌现出来的，语言结构是以完成说话人的交际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反映了他们的交际目的(Evans & Green 2006:108)。

语言是以体验经验为基础的，同时又与社会文化相关联(Hart 2019:1)。与语言形式相关联的许多意义在我们形成概念前从我们的经验之中发展出来，与我们的身体相互作用。我们观察物理环境并与其相互作用得出的经验是我们最基本的经验，并由语言所吸纳(Johnson 1987:206)。其它的与语言形式相关的意义是百科全书式的，来自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团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经验(Fillmore 1982, Lakoff 1987:113)。

从以上两个认识论的承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观点。一是语言并非由专门的语言模块所表征的，而是利用多种现存的认知系统；二是语言理解与产出中的认知过程并非语言所独有的，而是语言使用者利用了一些内在的认知过程，如记忆、感知和思维，这些认知过程在其它的领域也起作用。这些认知过程

本质上是概念的。语言的结构和过程在形式上并非纯粹是命题的和计算的，而是概念的和想象的(Hart 2019: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与语言相关的概念过程，包括范畴化、隐喻、转喻、概念整合、图式化、选择性注意、图形-背景分离、视角与指示(deixis)等。这些概念过程建构与语言表达相关的意义，当在话语中选择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我们就以某一方式识解这一情景。这些概念过程一旦用于语言描写，我们称之为“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s) (Croft and Cruse 2004:59; Langacker 2008:4)。识解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石，这使得认知语言学特别适用于批评话语分析，阐明篇章选择对读者或听者的影响。不管是形态屈折变化还是词汇与句法结构，句子的每个方面都包含了识解，当说出一个句子，我们潜意识地组织要表达经验的每个方面。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把语言看作为一组用于意义建构的提示。通过不同识解，我们在交际中共同关注和处理意义建构，语言使用引起的概念化是在语义丰富、动态和主体间共享的表征中向听读者传达说写者想要表达的目标情景(Hart 2019:3)。

尽管认知语言学家承诺其研究都是以使用为基础的，但多数研究均使用作者自己编写的例句，这些例句都是句子层面的，脱离具体的使用语境。这些语料无法反映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语言在话语中作为语篇的一部分出现。话语与语篇处于空间-时间中，也同时处于社会-文化中，话语发生的语境超出“这里”与“现在”即时的情景坐标(situational coordinate), 吸纳更广泛的体制场境，包含话语背后的知识、信念、价值、规范、常规和期待(Hart 2019:4)。话语与语篇反映了人们真实的语言活动，话语中产生的语篇展现了不同的语体或体裁。语篇是由社会语境与其产生的交际体裁所构成的，同时后者又构成了前者。认知语言学应该使用真实和自然的话语与语篇作为语料，从而使认知语言学真正做到“基于语言使用的”。批评认知语言学一旦使用了真实与自然的语料，可以证明认知语言学中某一理论的适用性，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细化理论和创新方法(Hart 2019:5)。

认知语言学中许多理论不断地拓展到不同社会语境和交际体裁的话语与语篇分析之中(Musolff 2016; Hart 2014; Dancygier 2015, 2017；Zhang & Di 2016；张辉、江龙 2008；张辉、杨艳琴 2019), 有一些理论专门探究思维中的语篇分析，大多运用在文体学(Harrison 2017, Stockwell 2002, 2007)与批评话语研究(Chilton

2004; Hart 2014; Koller 2004; Musolff 2016)之中，业已成为认知语言学应用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

2 本书的两个大部分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的部分：**第一部分是述介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包括第 1、2、3、4、5 与 6 章；第二部分是其理论框架的应用研究，包括第 7、8、9、10、11、12、13 与 14 章**。第 15 章是结论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2.1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我们首先讨论了概念隐喻如何应用到批评话语研究中。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隐喻不仅仅只是语言层面的问题，隐喻反映了我们人类的主要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主要是以框架化（framing）的方式运作的。框架主要用于表征某一领域和经验的概念知识，如果我们使用一个框架来理解另一框架，那就是隐喻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通常是我们认知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手段之一。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我们选择一种隐喻而不选择另一种隐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哪些知识需要背景化？哪些需要前提化？通过某种隐喻，我们可以促进哪些推理、触发哪些情景？这些都是我们进行隐喻选择的重要因素。以“战争”隐喻为例，“战争”框架包含了许多结构特征，如暴力对抗或对立框架，其核心成分包括相互对应和冲突的群体以及侵犯者和受害者的不同视角等，其非核心成分包括“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手段等。我们常使用“战争”框架理解政治斗争和冲突，形成以“战争”隐喻为基础的理解。

最先使用隐喻探讨政治问题的研究是 Lakoff（1996/2002），他指出，在美国政治中存在两种隐喻模式：“严厉的父亲”模式和“抚养型父母”模式，两个隐喻模式分别反映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世界观。Musolff（2016）提出了隐喻场境（metaphorical scenario）的概念，并使用这一概念讨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另外，隐喻不仅仅反映在单一模态的话语中，也反映在其它模态之中，形成多模态隐喻。不管是单一模态和多模态隐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反映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观点。

与隐喻一样，转喻也反映了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话语中也能反映人的意识形态和立场观点。概念转喻本质上是一种突显关系，是认知语法中所讨论的侧重（profile）和背景关系中的一种特殊模式，都是以人的注意力为基础的。通过与概念转喻相关的侧重与背景操作、转喻操作和隐转喻，我们可以发现转喻在 CDA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是认知语言学重要研究范式之一，也是话语理解和话语管理（discourse management）的综合性理论。在话语理解中，人们在语言（或非语言）信息的提示下可以在思维中激活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各种知识框架，存储在工作记忆中，这些存储在工作记忆中的暂时的和在线的话语信息就是心理空间，而概念整合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机制。两个或以上输入心理空间经过组合、完善和详述三个基本过程，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之中，形成概念整合网络。概念整合基于关键关系（vital relations）(包括时间、空间、表征、改变、角色-价值关系、类比关系、部分-整体与因果关系)压缩，将复杂和抽象的概念“降解”为以人为本的尺度，即基于人的身体体验的理解。概念整合网络有四种基本的类型：单一网络、镜像网络、单一输入域网络和双输入域网络。概念整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描写意义是如何从现存的知识结构中创造性地建构起来的，把语言、声音与视觉图像等有意义的表达形式作为心理提示，动态地建构意义，适用于公共和政治话语的分析之中。

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 或 DST）是 Paul Chilton 在其 2004 年出版的专著《分析政治话语：理论与实践》（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Theory and Practice）中提出来（后来改称为指称空间理论（Deictic Space Theory），话语空间理论与其它理论不同的是，这一理论是专门用于分析政治和公共话语，话语空间也是基于心理空间的，因为话语空间是由话语驱动而由说写者构建的心理空间，是心理空间的一种类型。 按照 Chilton(2004)的观点，话语空间是以人的空间认知为基础的，通常从指称的视角来“锚定”（anchor）其它的物体、成分和事件，因此，话语空间的构造是一个三维空间，三维空间的中心就是话语空间的中心，称为指称中心（deictic centre），代表“我”、“我们”、“这里”和“正确”等。从指称中心延伸出空间、时间与情态（或价值）三种轴。空间轴，其中心代表“我”“我们”和“这里”，而其中心的外围代表“他、他们”

和“那里”。时间轴，其中心代表“现在”，其中心的外围代表“过去”和“将来”。情态（或价值）轴，其指称中心分别代表情态轴的“更大的可能性”和价值轴的“正确性”，而其指称中心外围则分别代表情态轴的“更小的可能性”和价值轴的“不正确性”或“错误”。

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 或 PT）是由 Piotr Cap(2013)在话语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继承话语空间理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了话语空间理论的不足。他指出，话语空间理论只关注话语空间中名词词组的定位，而忽视动词词组的作用，这一忽视使话语空间成为一个静态的空间，无法描写话语空间动态的变化过程。Cap 提出了“趋近化”这一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界定为一种强制的识解操作（a forced construal operation），指称中心之外的话语实体（outside-deictic-centre 或 ODC）在话语空间内会跨过一定的距离，逐渐侵入指称中心之内的话语实体（Inside-deictic centre 或 IDC），从话语空间外围向话语空间内部中心移动，形成了对后者的威胁，从而引起听读者的警觉，使他们寻求防范措施，避免威胁的发生。威胁可以来自三个轴。第一个轴是空间趋近化（spatial proximization），话语空间中边缘的实体被人们识解为在物理空间上侵占话语空间中心的实体。第二个轴是时间趋近化（temporal proximization），预见的冲突常被看作为是迫在眉睫的和重要的，需要人们立即采用防范措施。空间和时间趋近化包括强烈的恐惧诉求，典型的做法使用类比，把日益逼近的威胁和过去的灾难融合在一起，目的是支持现在的场境。第三个轴是价值趋近化（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识解 IDC 的价值和 ODC 价值之间的冲突，ODC 的价值常被物化为对 IDC 的人身伤害等。趋近化理论常被应用于政治话语、环境话语、科技话语和移民话语的分析之中。

Hart 提出了一套较全面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分析框架，称之为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Cognitive Linguistic CDA 或 CL-CDA）。他指出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操作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探讨话语意义的构建及其过程中产生的立场和意识形态。Hart 依据 Croft 和 Cruse(2004)对识解的分类分析识解操作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从格式塔（gestalt）、比较（comparison）、注意（attention）和视角（perspective）对图式化、范畴化、隐喻图形/背景等识解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结构型（structural

configuration）、框架化（framing）、识别（identification）和定位（positioning）的话语策略。Hart 把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应用到英国移民话语和政治抗议话语等不同的文体之中，提倡采用实验的方法，提出了批评话语研究的“实验转向”。

van Dijk 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虽然独立于批评认知语言学，但其研究为批评认知语言学打下了一定基础。van Dijk 提出的语境模式也是其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知与语境模式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宏观分析框架的基础。他认为语境是基于社会文化共有知识的一种动态的心理模型，可以解释了话语分析中许多问题，例如在同一语境中，不同的说写者在话语产出中为什么具有独特性和差异？不同的话语接受者为何对同一话语有不同的理解？为何话语随语境而变化？文体、语域和体裁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话语结构的？等等。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或 EP）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和批评话语研究融合的背景是模块论和强制。进化心理学的大量模块的假设（massive modularity thesis）认为，心理是由大量模块构成的，且模块具有领域特殊性，人的心理适应是以模块为形式和基础的，每个模块都像一个具有特殊目的和功能的小型计算机，可以解决与人类进化适应环境的生存和再现相关的某一具体问题，人类心理由成百上千个模块组成，常见的模块有欺骗者识别模块（Cheater-detection）、情感模块（Emotion）和逻辑-修辞模块（Logico-Rhotorical）等。进化心理学与批评话语研究融合的整体思路是，探讨语篇策略与模块之间的关系，两者间的互动以激活和操控为手段，通过语篇策略来激活模块或操控模块。

2.2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在 2.1 中我们逐一述介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从前面的述介我们可以看到，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框架或理论工具大多数来自认知语言学，如隐喻、转喻、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等；有些来自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框架，例如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有些来自其它学科，例如，van Dijk 的社会认知模式与语境模式和进化心理学。

本书的另一主要部分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的个案研究。我们首先做英汉的道德隐喻比较的个案研究，考察英汉语料库中道德概念在净脏层面的隐喻投射。界定干净与肮脏与物体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其放置的位置有关系，若物体放在正确的位置，则处于有条理有秩序的状态，即为“干净”，反之，则处于错位失序的状态，即为“肮脏”。例如我们吃的大米是干净还是肮脏，关键在于其放置的位置，大米放在碗里是干净的，但如果放在你的衣服和地面上，那就是肮脏的。判断“干净”与否的经验基础根植于人们日常的身体体验，与我们身体体验的图象图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研究表明，英汉道德投射范围高度吻合，二者的构成形式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分别对应为 “dirty+Noun”/ “污+名词”与“clean+Noun”/ “清+名词”，此外，汉语中还存在大量“黑+名词”的表达。这一研究探究了隐喻、认知和情绪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应用个案研究，我们考察概念转喻在农民工新闻报道话语的产出与理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了概念转喻在批评认知语言学中的应用范围。在 Croft 和 Cruse（2004）对转喻分类的基础上，Hart 在对移民话语分析中将转喻分为“内向型”（inwards）和“外向型”（outwards）两类。“内向型”转喻是参照点的内向转移，借助对目标概念或范畴的某一要素的指称，为整体目标概念或范畴提供心理通达，使这一要素得到凸显；“外向型”转喻是参照的外向转移，借助对包含目标要素在内的某个整体概念或范畴的指称、为该目标要素提供心理通达，使整体概念或范畴凸显出来。在中国新闻报道中，我们发现，除了以上两种的转喻类型外，还有一种“复合型”。

“内向型”转喻借助“农民工”概念范畴内的某种特征作为载体，为“农民工”的整体概念提供心理通达，使作为载体的特征在话语消费者的理解中得到凸显，同时其它在某种程度上则被背景化，例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外向型”转喻利用包含农民工在内的某个更大的整体概念或范畴作为载体，为农民工这一目标提供心理通达。在“外向型”转喻中，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被弱化，却凸显了农民工的整体概念或范畴，例如“民工”、“打工者”或“新移民”等。有些关于农民工的指称兼具了“内向型”和“外向型”转喻的特征，即兼具参照点向内转移和向外转移的两个方向的路径，如“流动人口”和“外来工”等。

除了关注隐喻和转喻在单模态话语中起到的建构作用外，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多模态隐喻和转喻，即它们不仅存在于语言模态中，还存在于其它非语言的模态中，例如图像等。我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的隐喻和转喻进行识别和解读，分析隐喻与转喻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两者在构成多模态话语衔接和连贯的不同作用。我们发现《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以隐喻和转喻为认知建构框架，运用语言、图像、声音、音乐等多种符号模态塑造中国国家形像和新的民族精神。

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是语言政策的新趋势，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我们运用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趋近化理论从空间、时间和价值三个轴考察我国高考外语的改革政策。在语言政策文本的分析中，语言政策制定的时间、空间和语言政策制定者的价值都是以指称中心为核心展开的，语篇产出者根据与指称中心距离的远近，构建话语空间/指称空间，语言政策制定的基本要素如语言政策制定者、制定过程、目标和语境等都可以在话语空间建构中得到体现。我们强调指出，语言政策的趋近化分析尤其体现在时间和价值轴上。从时间轴上我们可以看到高考政策历时的变化，从 2014、2017 和 2020 三个时间节点，与指称中心呈渐进的态势，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在价值轴上，《实施意见》构建了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即改革前的“唯分数论”、考定终身、教育不公平对应于改革后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和促进教育公平。” 我们通过高考政策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揭示了语言政策制定背后的认知动因，彰显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

政治领导人演讲是批评话语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我们的分析首先从整体的话语体系出发，然后再落实到话语空间的构建，进一步说明话语空间与其它话语体系要素之间的关系。话语体系包括话语主体、话语目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等要素。话语主体是话语目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的实施者，而话语主体、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都是围绕话语目的展开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策略也是相辅相成的，围绕话语空间的建构，可以使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我们以澳大利亚外长在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稿为语料，依据趋近化理论，从空间、时间和价值三个轴线对政治领导人如何构建话语空间，探讨了框架等话语策略及对其解读的范畴化、隐喻等识解操作。构建话语空间、运用话

语策略，分析识解操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话语强制说服目的，即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

运用趋近化理论，采用语料库的方法，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了政治冲突话语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话语。在探讨政治冲突话语时，我们提出话语空间和趋近化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Levinson（2003）指出空间认知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Searle（2010）也认为，语言必须遵循一个单一且统一的原则来构建基于“共享意图性”（shared intentionality）的社会世界，这一原则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他们都认为，空间与时间在客观世界与话语构建的符号世界之间起到了一定的媒介作用。通过空间认知的优越性，空间概念投射到抽象概念之上，从而理解抽象概念。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类的经验不仅体现在空间认知中，也体现在时间概念中。除了空间和时间在认知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价值（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在话语空间的构建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空间、时间和价值是构成话语空间的三条轴线，形成话语空间和趋近化。

我们在探讨政治冲突话语时选取中、美和叙利亚各自的媒体对叙利亚局部战争的报道采用话语空间和趋近化理论和语料库方法研究不同的各方在同一事件报道所采取的趋近化策略。我们发现，美叙两方都使用大量的空间趋近化策略，辅之以较为充分的价值趋近化策略，以自我和人民为话语空间内部实体（IDC 或 Inside Deictic Centre），以对方和恐怖组织为话语空间外部实体（ODC 或 Outside Deictic Centre），构建 ODC 向 IDC 趋近，产生威胁的话语空间，形成激烈的互动态势。美叙中三方在时间趋近策略中都采用过去到现在的概念转移，突出战争产生影响的历史性、紧迫性和急速性。随着指称中心的转换，IDC 与 ODC 阵营的分布及相互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美方凸显叙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建立叙利亚政府与恐怖组织的联系，突出其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以加强自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叙方凸显美方军事侵略行动，建立美国与恐怖组织的联系，突出其对人民利益的威胁，以取缔美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中方表示对叙利亚的同情，对美国进行谴责，在空间、时间和价值三轴坐标中拉近叙利亚与原点坐标的距离。中国不欲激化事态，在价值观上表示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护，希望以和平理性手段积极解决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建立了中国和英美主流媒体 “2018 长生疫苗事件”报道语料库，剖析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话语，揭示不同的话语生产者在同一事件上，将其意识形态与防御措施合法化的表征方式。研究表明，中外媒体在空间趋近策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话语空间内部实体/话语空间外部实体阵营的划分。中国媒体将中央政府和假疫苗受害者识解为 IDC，取缔“长生公司”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英、美媒体则把儿童和国际市场识解为 IDC，将中国与“长生公司”一同识解为 ODC。时间趋近策略方面，中外媒体的选择存在一致关系，均注重过去到现在和现在到将来的概念转换。另外，中外媒体识解的 IDC/ODC 价值也不同。中方着重生产标准和质量，视金钱利益至上为威胁；英、美媒体则把安全和信任作为价值导向，谴责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疫苗事件”中的贪污腐败行为。这一研究亮点主要体现在趋近化理论研究中采用明确的量化和明晰的语料检索手段。缺乏语料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整个语料检索与分析过程模糊不清 (Cap 2013:24)，不太可能复制或印证其研究结果 (Malcolm 2014)。这一研究提高了趋近化理论研究的可复制性。

我们在本书探讨美国战略情报话语。为了能综合地分析这一体裁的话语，我们试图构建一个结合批评隐喻分析、概念整合理论和话语空间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我们首先指出这三个理论可以整合的前提，即它们都具有共享认知原则和特征以及互补的关系。这三个理论都坚持共享原则，强调身体经验和概念化在意义建构和对现实进行识解中所起到的作用。共享的特征是可选择性，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是有选择的，而不是把所有的特征到投射过去。同时这三个理念存在互补的关系，不管语言表达是隐喻性或非隐喻性的，话语中的话语策略和认知偏见都是由各种类型的语言表达所实现的。对于隐喻表达，批评隐喻分析和概念整合可以协同分析，而对于非隐喻表达，概念整合和话语空间则可以协同分析。概念隐喻分析涉及我们长时记忆中存储的知识，而概念整合和话语空间则关注意义在线的建构，涉及工作记忆中的知识，而后者的知识来自长时记忆中的知识、语境知识和语言解码所产生的知识。这三个理论所整合成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战略情报话语提供更全面与综合的分析与解构。

对于隐喻分析，我们识别了报告中使用的隐喻的三个主要的来源域：舞台、旅行和建筑。舞台隐喻界定在同一舞台上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关系，识别内部人和外部人，某一国家采取何种政策打下了基础。旅行和建筑隐喻突显了一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在相互竞争的另一国家眼里，这一努力受到了负面的评估，影响决策者对目标国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基于语料库方法，批评隐喻分析有助于我们揭露隐喻使用背后的语言策略、影响隐喻选择的认知和社会因素，随着时间迁移，关键词变化突显了某一观点。对于概念整合网络而言，当情报分析者试图预测未来时，考察心理空间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一些关键关系是如何被压缩的是情报分析中关键的一步。概念压缩可以是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其目的是服务于情报分析者的意图。就像关键关系“时间”和“变化”一样，情报分析者选择它们来分析历史的演变过程。但在多数情况下，概念压缩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然发生，在过度评估的认知偏见情况下，这一情况反映在“因果”关键关系以及锚定在“角色－价值”概念压缩之中。有意识的策略和无意识的偏见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政策干预，改变或锁定某一发展的轨迹。就话语空间分析而言，通过集中分析两种情态动词，我们讨论了情报分析者如何展现他们所描述的“现实”以及决策者对这一“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义务情态基于美国战略思维固有的意识形态，界定情报分析者的道德标准，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赋予决策者以道德负担。对于认识情态，“will”反映了评估可能性时分析者所持有的有把握的预判，作为合法化的策略说服决策者接受战略情报报告中提出的命题，而不确定性的表达是歧义的主要来源，容易导致决策者把情报分析者的解释与起自己的偏见混为一谈，从而影响了战略情报报告的有效性与可信性。

我们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指出了目前批评话语研究，特别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展望了其未来的研究方向。